

# 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坚实支撑

姚进

## 深度观察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有基本面和政策面两大支撑，基础坚实。应继续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综合施策，稳定预期，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坚决平抑汇率大起大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近日走出强劲上涨势头。11月30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突破7.10关口。12月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升544个基点。12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调升683个基点，报7.0542。

人民币汇率走强背后的原因，短期来看，受到市场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近期，美元指数高位回落是推升人民币对美元走强的直接因素。目前，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在加强，在通胀数据降温回落、美联储“暗示”放缓加息的背景下，美元指数11月累计跌幅超5%。而国内经济回稳向上的预期在加强，近期国内围绕疫情优化、房地产等领域利好政策频出，提升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运行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对其他主要货币有所升值。受美联储加快加码收紧货币政策、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美元大幅走

强，美元指数上涨约17%，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货币超历史行情显著走弱，比价效应带动同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约10%，但人民币仍对欧元、英镑、日元升值3.3%、8.3%、12.5%。二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基本稳定。汇率指数作为一种加权平均汇率，主要用来综合计算一国货币对一篮子外国货币加权平均汇率的变动，相比双边汇率而言，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一国货币的价值变化。运行特点体现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市场供求总体平衡。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仍有坚实基础，有基本面和政策面两大支撑。

稳定最大的基本面。5月份以来，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地见效，有力稳定了市场预期和信心，经济回升向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力、有度、有效，我国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保持了物价形势稳定。尽管经济短期面临下行压力，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是世界经济增长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国际收支大盘基础坚实，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本盘。前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104亿美元，同比增长56%；1月至9月货物贸易顺差6452亿美元，同比增长52%。贸易渠道充沛的资金净流入充分满足企业和居民用汇需要，这是外汇供求得以平衡、外汇市

场得以平稳运行的基本盘。

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政策面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宏观审慎管理不断完善，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同时，监管部门已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提高，汇率弹性明显增强，较好发挥了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

看过去，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了多轮外部冲击的考验，人民币汇率均能灵活调整，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均衡，有效发挥了抵御外部冲击的“缓冲垫”作用。面对多轮汇率超调，监管部门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能够有效管理市场预期，为汇率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向前看，应继续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综合施策，稳定预期，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坚决平抑汇率大起大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近日，商务部发布今年1月份至10月份我国利用外资数据，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898.6亿元，同比增长1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1.7%，吸引外资质量增质优趋势明显。在世界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国际投资疲软的背景下，我国仍然获得外资青睐，成为自1993年起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折射出强大“磁力”和发展韧性。

随着我国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吸引外资的驱动因素逐渐转变，由成本驱动逐渐转向市场和制度驱动。一方面，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了人口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带来了庞大且潜力无限的国内消费市场，给外资带来无限商机。

另一方面，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施制度创新，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系列开放措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化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落实RCEP等国际区域合作规则，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吸引外资制度红利，形成吸引外资质量增质优的制度保障。

尽管短期内受疫情影响，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技术积累创新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完备且支撑力强，拥有雄厚产业基础，产业配套齐全，技术开发成本较低，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优势。外资在中国能拥有长远稳定的发展环境，能在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中获得更多机会，且能更好获得所需的各种产业配套支持，形成了我国外资量增质优的持续动力。

就国际发展大势而言，尽管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世界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没有改变，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因没有改变。像中国这样稳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持续、配套良好、具有多层次市场红利和创新性制度红利的国家，自然受到外资青睐。

未来，中国吸引外资将逐渐向引导外资方向转变。应顺应产业结构升级趋势，逐渐引导外资向高技术、高标准、绿色低碳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投入，持续提升投资结构，夯实引导外资的优势基础。

要强化国内基础。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对不符合外资准入条件的规章予以废止和改革，创新实施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化、政府采购公平化、外商诉求处理及时化、服务保障精准化。建设公平有序、竞争规范、高效开放国内统一大市场，打通市场关键堵点，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资源畅通流动，在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基础上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增强外商投资信心。鼓励外资企业在华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引导外资实现产业升级。

要夯实国际保障。大力推动国际区域合作，深化RCEP合作，积极申请加入CPTPP、DEPA等区域经贸合作协定，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中国产业链紧密融入、牢牢嵌入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增强利用外资的持久韧性。倡导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力开展与头部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合作，拓展外资合作国际空间。积极开展对外招商，创新招商模式，推动政府部门、投资促进中介、外商服务公司联合“走出去”，在国际上宣介中国投资优势，展现中国市场魅力。

蓝庆新

# 高载能产业西移需过三道关

陈发明

集的优势，也不是所有高载能产业都符合地方的生态环境功能要求。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必须守牢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其次，是能效关。从当前高载能产业的发展实际看，一些企业、一些项目受各种因素影响，能效水平仍然不高，有的是因为投资规模大，需要分段实施；有的是技术水平所限，行业工艺整体滞后；等等。能效是高载能产业的生命线，对于低能效的产业和项目，需做出科学评估，严格按照标准实施，不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

再者是环保关。在绿色低碳背景下，环保要求是高载能产业不可突破的“紧箍咒”。产业项目的引进，既要符合区域生态环境功能要求，通盘考虑地方环境容量，也要严格考量单个企业、单体项目的环保水平是否达标。坚决树立生态优先理念，确保环保硬约束不敢松、不能松。

当然，过了这三关，也不意味着高载能产业就能在西部地区顺利集聚。《通知》特别指出，“进一步优化西部地区营商环境”。西部地区虽然具有清洁能源富集和发展空间广阔

的优势，但要真正实现产业集聚化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短板弱项。比如，在硬基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基础配套。高载能产业带来的往往不仅是一座工厂、一家企业，而是会延伸出一个产业链条甚至产业集群，这对基础设施、上下游配套等要素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软环境方面，西部地区

在服务企业、落实政策等具体行动上，仍需进一步优化改善。

高载能产业向西转移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聚，一个“饭量大”，一个“口粮足”，虽是一次“双向奔赴”，但并非一路坦途。既要迁移者过得了关口，也要接纳者能搭建好“新房”，唯有双方满足彼此标准，才能实现共赢。

图① 近年来，内蒙古通辽市大力推进建设风能产业集群。随着多个新能源产业项目落地生根，通辽市正做优做强风能产业，为当地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路径。图为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珠日河风电场（10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 发挥森林认证对“双碳”支持作用

谢屹

在近期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上，“森林与气候领袖伙伴关系”行动启动，表明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一领域存在巨大潜能待挖掘、释放。

森林是水库、钱库、碳库，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森林认证是对森林资源经营、林产品加工制造开展的合规性认证，致力于推动林业领域实现绿色生产，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实现“双碳”，核心在于增加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以及降低来自生产和生活的碳排放量。“双碳”目标为森林认证发展提供方向引领，森林认证则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森林认证对“双碳”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对森林资源经营体系进行认证，推动森林数量和质量双增长，特别是促

进单位蓄积量这一关键质量目标提升，促进实现“双碳”目标中的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目标。

其二，对林产品产销链监管体系进行认证，确保使用的木材、竹材等原料来自于可持续经营的森林，加工制造活动符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求，生产供应绿色林产品，符合“双碳”对于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目标。

其三，为市场提供认证产品，丰富绿色产品种类、营造绿色消费氛围，为绿色生活方式形成提供支撑。森林认证标识采用绿色的树叶或树形作为主要图案，认证产品张贴或印制森林认证标识，容易被消费者辨别，成为推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有力工具。

我国国家森林认证体系(CFCC)2010年建成并开始运行，2014年与国际森林认证体系计划(PFCC)实现互认，PFCC涵盖我国所

有林产品出口国家。由此，经CFCC认证的森林经营单位、林产品加工企业向其他国家出口林产品，均将被作为认证产品，这是国际林产品市场的“绿色通行证”，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提供“绿色引擎”。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森林认证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不但森林法中明确规定“林业经营者可以自愿申请森林认证”，还建成由5项国标、26项行标组成的技术标准体系，包括森林经营、产销链认证，涵盖竹林经营、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自然保护区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等10余项活动。

但我国森林认证体系还不够发达，发展动能不足。迄今，全国通过CFCC认证的森林不足全国森林的百分之三；通过CFCC产销链监管认证的企业数量、经认可的CFCC认证机构、审核员也有限。究其原因，是森林认证体

系的供需互促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就需求侧而言，知道森林认证的消费者少，能主动购买认证产品的更少，使得不少认证产品难以通过“生态溢价”售出。不少企业因此无意愿参与认证、提供认证产品，供给侧发展乏力，使认证服务体系难以快速发展。

解决好森林认证体系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具有迫切性、重要性，对此，可从加强宣传、完善机制和能力建设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应加强社会宣传，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模式，增强需求侧驱动力。完善监督和激励机制，引导森林经营单位和林产品加工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建立森林认证产品的精准供需通路，建成认证产品“生态溢价”实现路径，增强供给侧驱动力。加强行业能力建设，利用好涉林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资源，拓展审核员队伍，支持认可机构提质扩面，提高市场推广能力，提升认证服务水平，增强行业驱动力。



图② 近年来，位于黔桂交界赤水河畔的贵州省罗甸县红水河镇积极落实“林长制”“河长制”，持续开展造林护林工作，不断强化河面巡逻和治理，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图为11月2日拍摄的罗甸县红水河畔景色。

新华社记者 杨 极摄